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庄子全译

[战国]庄 周 原著 张耿光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庄子全译

[战国]庄 周 原著 张耿光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袁华忠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小 米

EL90/10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 话：623202

列 子 全 译

王 强 模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9.375 印张 23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2000 册

ISBN7—221—02865—6/I·3732 定价：(平) 7.50 元
(精) 10.50 元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EL90/10

前 言

《庄子》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无论是在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无论是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也都十分深远广泛。本书不可能对《庄子》一书作出全面介绍，目的只是通过现代汉语的注译，帮助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阅读这部先秦典籍。

—

《庄子》的主要作者是庄子。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早期宋国蒙城（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庄子的生平事迹历史资料不多，生卒年月更很难确切考定。最早记载庄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上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据此马叙伦先生考定其生卒年代是周烈王七年至周赧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369年至前286年，大体跟孟子同时或偏早。

庄周曾做过蒙城的小官（漆园吏），但不久辞去，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史记》上还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是庄周并未接受，“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庄周一生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就是《庄子》一书中也多次写到他鄙薄高官厚禄的故事。他居处陋巷，向

人借粮，自织草鞋，穿粗布衣和破鞋，甘愿闲居独处，与《史记》中简单的记载是吻合的。

庄周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战国初年，周王朝已名存实亡，诸侯兵戎相见，战乱频仍，群雄割据，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大诸侯国争霸天下，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极为尖锐而又复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继儒、墨两家之争以后，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流派竞相而起，借助社会的动荡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势。庄周目光敏锐、博学纵览，深通各家学说，而且身居卑微，不慕富贵，嘲讽权势，在《老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风格。

《庄子》一书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史记》中已能见到现存于《庄子》中的部分篇名，但并未记载《庄子》有多少篇。《汉书·艺文志》上说《庄子》有五十二篇，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庄子》只有三十三篇。这是根据晋代郭象的注本流传至今的。三十三篇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至于三十三篇的真伪问题，宋代以前从未有过异议，认为都是庄周所作。自宋代苏轼以后人们对《庄子》篇目的真伪却有不少争议，认为少数篇目不是庄周所作，也不像庄派后学之作，理由不外乎部分篇目的思想内容与庄周一贯的主张不尽吻合，或者笔意浮浅，风格与庄周汪洋恣纵的特点不一致。纵观全书，的确有个别篇目无论就内容说还是风格说都与全书格调不能合拍，但仍不能足以证明就是伪托之作。正如先秦许多典籍往往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一样，庄派的后学者在成书过程中确曾起过整理或增删的作用，更何况像庄周这样一个“心如泉涌，意如飘风”的大家，其思想会是那么纯一，先秦各家思想互相渗透和影

响的情况是随处可以找到材料说明的。因此篇目真伪的讨论对于理解《庄子》的内容并没有多大意义。

西汉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封建统治阶级感兴趣的只是利用儒家思想有利于维护封建秩序的一面，《庄子》理所当然地不被看重。经过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荡和三国时代的纷争，士大夫目睹征战之苦和社会的黑暗与残暴，用托古喻今的办法寄托他们的反抗，表白自身的高洁以及对当世的否定，于是玄学盛行，《庄子》这才受到世人的重视。晋人司马彪、崔譔、向秀、郭象等纷纷为《庄子》作注，这对于保存和流传《庄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隋唐时代注疏《庄子》的本子已经有二十多种，以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庄子音义》和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最有价值。宋代以后研究《庄子》的人多侧重于它的哲理方面，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就很有成就。清代王夫之的《庄子通》在研究《庄子》的哲学思想方面也很有见地，至于清代的考据校勘工作更为《庄子》的整理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庄子》的注解进行汇编工作的是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而郭氏的成就更高，它在辑录郭象的注、成玄英的疏和陆德明的音义的基础上，又大量采录了王念孙、俞樾等大学问家的训诂考据成果，因此流传颇广，很有价值。

《庄子》一书风格独特，它把深奥玄妙的哲理与生动具体的形象熔于一炉，使抽象的逻辑思维与具体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它想象丰富，构筑奇特，笔调婉曲，意气纵放，思想内涵发掘之深，语言文辞设置之妙，堪称当世之绝。

二

《庄子》的哲学体系是博大精深的，其中心就是“道”，这也是

道家学派的由来。“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集中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科学认识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道家学派对宇宙本体和物质变化的总的认识。“道”有多层含义，可以指宇宙的本原，可以指万物发展变化所依循的规律，又可以指宇宙万物的同一性，同时“道”还可以视为哲学领域里的一种境界。

宇宙万物是怎么形成的呢？《知北游》中有一句重要的话：“通天下一气耳”；《则阳》又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全书多次讨论到生命的起源。《庄子》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起源于“气”，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田子方》还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气”乃是构成物质形体的原始材料，战国时代许多哲学著作都有这样的认识；而最大的“气”又是“阴”与“阳”，阴阳交媾就会形成物体。可知“气”与“阴”、“阳”是客观存在的，是具有物质性的东西。

但当时《庄子》所能认识的物还是有形、有色、能够感知的物，这就使它在探讨宇宙本原时受到很大局限。《达生》说：“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这里给“物”所下的定义就只能认为是能够感知的物。“气”合而成物，“气”又是怎么来的呢？天地又是怎么形成的呢？《知北游》说：“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这就是说产生有形之物的一定不会是能够感知的物，就像产生天地的一定不会是天地那样的东西，于是只得求助于“无”，万物的客观存在又是从“无”开始了；当然这个“无”就不宜视为“没有”，而是针对“貌象声色”的“有”而说的。《庚桑楚》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于无有”，这样自然就归结为“道”。《大宗师》也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就被视为宇宙的本原，能产生天地驾驭鬼神，但又无有形象不可感知。可知《庄子》中的“道”具有两重性，既不是人格化了的神，也不是超越了客观世界的主观意念，而是一种客观存在。从这一角度说，“道”也就是“气”的推进，“气”的抽象化，但“道”又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无形无象，不可捉摸，更不可描绘与言传。

“道”又是“一”的同义语，常用来称述事物的总体性、同一性。《庄子》认为既然事物都源于气，各种事物尽管千差万别，归根结蒂其本质却是同一的，没有差异的，所谓事物间的对立与差异，全是人为划分的结果。《庄子》中所描绘的“太初”景象里，宇宙万物是“芴漠”、“浑沌”而融于一体的，至于各种事物的生灭与变化，那也是整个物质世界内部发展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某一事物的消亡就意味着另一事物的产生，这一事物的形成也同样意味着他事物的分解与毁坏。千变万化的世界便总是一大整体。从同源引申为同质，这是“道”的第二层含义。《逍遥游》中的“万物以为一”，《齐物论》中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大宗师》中的“天地之一气”，《知北游》中的“通天下一气”，《天地》中的“万物一府”，《秋水》中的“万物一齐”，都是用来讨论事物的总体性、同一性的，归结起来就是“万物皆一”（《德充符》）和“道通为一”（《齐物论》）。

《庄子》中的“道”又是规律和自然的同义语。全书十分注重事物的运动与变化，认为各种事物总是处在不停地变化发展中，《秋水》中就说：“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那么谁在主宰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呢？那就是事物自身，也就是说一切运动变化都是自然地出现、自然地形成、自然地发展、自然地消失，即一切都是

本来如此、必然如此。《知北游》中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天道》中又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由此可知“道”就是事物的本然性和必然性，即事物的自然规律。《缮性》中说：“道，理也。”既然“道”是永恒的、固有的，因而只能“循道而趋”，遵循它的必然规律。

《庄子》一书中多次谈到“体道”一事，表面上看，“体道”乃是个人自我修养，其实是追求一种宇宙精神，追求物我交融的心态，从这一角度说，“道”又是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境界的基本特征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圜垠之野”（《应帝王》）。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当然得去除各种内外的阻滞和障蔽，包括超越外在各种因素的诱惑与影响，突破自身形骸的拘限，并消除一切智能活动和成见；同时还要培养起死生如一的心态，从了解宇宙变化的真情中逐步凝聚自己的精神世界，即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死”以及“离形去智”而达到“坐忘”、“心斋”的境界。这样的精神境界既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也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

《庄子》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的相对论认识。首先《庄子》认为事物总是相对而又相生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正反两个方面。拿形成万物的“气”来说，同样存在阴与阳相对相生的性质，天与地、日与月、动与静、明与晦、生与死、消与长、男与女、雄与雌等等就是最普遍的阴阳相对相生的概念。

其次《庄子》认识到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它相对立的方面转

化。《齐物论》说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总结出事物分化与合成的对应发展的基本趋势。《则阳》又进一步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言而已。”

第三，《庄子》认为从“道”的总体性、同一性的角度说，宇宙万物尽管千差万别，小与大、短与长、美与丑、分与成，说到底又是齐一的，没有区别的。

第四，《庄子》认为确定认知的标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认知都会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受到时空的制约。如果离开特定的条件，超越了时空的制约，认知就只能是相对的。《大宗师》说：“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加之“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秋水》），认知也就只具有相对性，不可能有客观划一的标准。全书多次举例说明时空的无限性、事物变化的不定性以及认知主体的局限性，从而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掩盖了相对关系中的绝对性因素，于是导向不可知。《齐物论》中说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齐物论》），错误当然不言自明。由此，《庄子》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任何辩论的双方都无所谓是非，因而言论也应是齐一的了。

《庄子》的哲学思想深邃玄妙，它触及到认知世界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处处闪烁出人类思维活动的火花，当然它也深深打上了

那一时代的烙印。

三

再来讨论《庄子》的社会观。《逍遥游》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天道》又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通观全书，“无为”和“无己”就是《庄子》一书政治主张和生活旨趣的高度概括。

《庄子》中的人物众多，上至诸侯国君，下到奴仆屠者，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面貌的人都能深深留下印记，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所组成的形形色色的事，反映出那一时代的社会画面。《庄子》认为社会“沈浊”，“不可与庄语”，因此该书大多采用寓言的曲折手法，透过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探求更为深邃、更有价值的哲理。

《庄子》一书充分表现了庄周愤世嫉邪的思想和情绪。它抨击各国诸侯的征战，谴责他们给人民带来祸殃，《徐无鬼》中说：“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指出他们“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并且直接戳穿统治者挑起战争的欺骗蛊惑手段，“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它认为一切虚伪、欺诈、盗窃等社会弊端全都是统治者造成的，《则阳》中借古讽今说：“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罪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

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山木》还直接指责统治者是“昏上乱相”，《胠篋》说得更直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正是因为统治者的肆虐，才会造成“今世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社会惨况。书中对于权贵的嘲讽，对于社会名流的讥诮，对于贪婪、欺诈、虚伪、骄矜、故作姿态等等丑行的揭露与批判，是举不胜举的。

然而，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面对社会的矛盾与动荡，庄周却未能看到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走向了另一极端，主张退回到原始朴鄙的社会去。《庄子》认为社会的不公与丑恶，是跟统治者出现于政治历史舞台分不开的。《庚桑楚》就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也。”因此《庄子》在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多次描绘出原始“至德之世”的景象，作为他政治理想上的追求。《胠篋》说：“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马蹄》还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这实际上是让社会倒退到原始蒙昧的时代。

《庄子》复古倒退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乃是庄周及其后学者面对社会黑暗与不公却又看不到出路的叹惋与哀吟，同时也是其哲学思想在社会政治理念上的必然归宿。庄周所能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社会，是弱肉强食的现实，应运而生的各种游说之士摇舌鼓唇，不外乎是些追名逐利之徒，他们的主张并不能真正使社会得到安宁，仁义与兼爱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在洞悉真伪之余更感到社会有越治越乱的趋势，于是也就把眼光投向远

古，由伤今而至怀古了。

同时《庄子》的“道”强调了宇宙的本原和事物的总体性、同一性，强调了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强调了外在世界归根结蒂只能统一为“一”的归宿，因而在政治理念上势必会追求无有等级差异、人人事事顺应其位并得以自然发展的境界；这又与哀叹世事、悲愤当今的思想一拍即合，并进而在批判仁义、摒弃贤圣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抵毁文明和进步的主张。正如《胠篋》中所提出的“搢斗折衡”、“擢乱六律”、“灭文章”、“散五采”、“绝钩绳”、“弃规矩”，这样，“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更有甚者，《庄子》还错误地认为社会进步，会使人们耽于心智，妨碍体道的进程，甚至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天地》中就写有反对机械吸水的故事，理由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了。

一方面斥责仁义和圣贤，一方面弃置聪明与智巧，把这两者并合起来，就是《庄子》一书治世的总方针，《在宥》就说：“绝圣弃知，天下大治。”照此构想，功利还有什么用，无为也就是最大的作了。

《庄子》所倡导的人生态度的中心是顺应自然。既然社会的发展，乃至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改变，因此全书多处提出对人为的批评，指出有为的有害性。全书认为要真正做到无为，首先还得忘掉自我，“无己”之后当然就不会受外物所拘滞，不会去追逐名利，不会去谴责是非曲直，这样才“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然后才是有感而应，凝神寂志，并最终达到恬淡自适的境界，正像《天地》所说的那样：“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至”。《庄子》人生哲学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对待生死的态度。庄周主张生死不分、死生齐一，即超脱生死，置死生于度外。《刻意》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大宗师》也说：“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与死既然都是“气”的聚合与离散，因而“死生同状”（《天地》）。就是他临死时还在风趣地对弟子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列御寇》）

顺应自然固然有遵循客观规律的积极一面，但一任顺应，过分强调了事物的自身运动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势必又导向其反面，走向听天由命的宿命观，这又是庄周人生态度上的消极面。《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非之变，命之行也。”把困厄、贫富、好坏、毁誉看作命运的安排，这当然是应当加以批判的。

《庄子》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谴责人为征战的恶果和社会不公，一方面又希图让人安于现状；一方面指出了事物的对立转化，另一方面却又大倡不可知论，其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到对待儒学的态度上。全书多处痛斥儒家的仁义之道，揭露其学说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但在具有后序性质的《天下》篇中却没有用一个字来谴责孔子和儒学；有的篇章抨击孔子真是一点不留情面，有的篇章却褒扬孔子身临厄境还能泰然处顺；全书反复倡导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但个别篇章又滑向“上必无为有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天道》），甚至《天下》等篇还提出了所谓“外王”的概念，用与“内圣”相对，这都与庄周的初衷不尽吻合。其实这些矛盾现象正反映出《庄子》思想的复杂性，说明《庄子》思想体系本

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要知道活跃在当世的众多学说体系不可能不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不同的境况，不同的心绪也会不自觉地偏离初衷。

四

《庄子》文情跌宕，意境深远，变化莫测，恣肆汪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甚至可以说代表了那一时代散文艺术的最高成就。人们常常把它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称，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这样评价：“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之。”

《庄子》的艺术特点最重要的是寓言，司马迁就曾说过：“其著述十余万言，太抵率寓言也。”寓言的形式大大增加了《庄子》的文学形象性。《庄子》全书描写了许多有趣的人物，这许多人物有不少在历史上也是有名有姓的，如像孔子、盗跖、老聃、列御寇、宋元君、魏惠王、惠施、公孙龙、接舆、许由、子产等。有名有姓并非真有其事，故事是编出来的，人物是为其表达设置的，为其主题服务的。杜撰的人物更是多得不可胜举，盗墓的大儒与小儒，奇丑怪异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和哀骀它，仿效西施抱胸蹙眉的东施，善于把无用看作有用的匠石，专心致志的痄僂，出神入化的东郭子綦，故作姿态的尸祝以及许许多多体道者的形象。就是那些小动物，也被拟人化而具有了鲜明的个性。

但是《庄子》写人叙事目的并不在于写人叙事本身，而是为了寄寓深刻的哲理。故事和人物是作为形象化了的论据出现的，这就使深奥的道理和生动的形象结合起来，使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散文意境，从而加深了它的哲理论